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形成中的東亞共同體

The Emerging East Asian Community in the Asia-Pacific Area

doi:10.30390/ISC.200506_44(3).0002

問題與研究, 44(3), 2005

Issues & Studies, 44(3), 2005

作者/Author：金榮勇(Rong-Yung King)

頁數/Page：33-5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5/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506_44\(3\).0002](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506_44(3).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形成中的東亞共同體

金榮勇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一研究所研究員)

摘要

本文從過去十餘年來東亞與東南亞經貿整合的角度來探討整體亞太政經形勢的變遷與重組，以及本區域內幾個主要國家的角色變更。本文的主要論點認為如果東亞共同體能在未來十年左右時間順利成形與運作，對於自二次大戰以後一直主導亞太政經事務的美國，是一大挫敗；美國的角色將逐漸成為東亞區域政治權力的分享者、經貿事務的競爭者與軍事安全的監督者；東亞各國的自主能力大幅提高，而中國和日本將會主導東亞共同體的運作與發展事務，就如同德國與法國在歐盟的主導地位一般。雖然作者認為中日的角色日益重要，但是在中短期（五至十年）內，東亞共同體的運作與功能仍然是在摸索中緩步前進；至於歐盟的經貿整合程度，在可預見的將來，對東亞各國而言仍僅僅是一個目標而已。

關鍵詞：東亞共同體、東亞高峰會、東亞區域整合、美國亞太政策

* * *

壹、前言

去（二〇〇四）年底的東南亞國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簡稱東協 ASEAN）高峰會結束時，東協秘書長 Ong Keng Yong 宣布在今年於馬來西亞所舉行的東協高峰會時，將召開東協和中國、日本、韓國元首的高峰會，為即將成形的東亞共同體（East Asian Community, EAC）奠下基石。為了要確定東亞高峰會的議題與形式，各國外長於今年五月在日本京都集會討論詳細內容。此次的東亞高峰會和過去的「東協加三」（ASEAN+3）高峰會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未來的東亞高峰會將脫離以東協為主體、中日韓為客卿的形式，走向以中國、日本或中、日共同主導東亞區域整合的發展模式。

這項令世人矚目的發展並非從今日開始，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迪（Datuk Seri Mahathir Mohamad）在一九九〇年底的全球關稅暨貿易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談判失敗後，即提出成立東亞經濟集團 (East Asia Economic Group, EAEG) 之機制，做為和西歐、北美二大經濟體系抗衡與談判的平台。馬哈迪總理的倡議雖然得到許多東亞各國有識之士的附和與掌聲，令其個人的國際聲望大幅提高，不過EAEG的倡議受到美國的反對以及中國、日本的不願意加入而不了了之。^①在一九九七年的東亞金融風暴發生後東亞各國痛定思痛之餘，決定採取所謂的「區域聯防」政策，以避免被國際金融炒家各個擊破，因此有「東協加三」高峰會的定期舉行。未來的東亞共同體即為東亞各國進一步落實東亞區域經貿與金融整合的重大發展。

本文即從過去十餘年來東亞與東南亞經貿整合的角度來探討整體亞太政經形勢的變遷與重組，以及本區域內幾個主要國家的角色變更。第一部分概述過去十餘年東亞各國對於參加區域經貿組織從否定排斥到積極參與的軌跡，當然一九九七年的金融風暴是主要的觸媒。第二部分則分析此次東亞共同體成立的原因、發展與可能走向。最後是探討東亞共同體對於亞太地區政經秩序與生態的衝擊與長遠影響。至於本文的主要論點認為如果東亞共同體能在未來十年左右時間順利成形與運作，對於自二次大戰以後一直主導亞太政經事務的美國，是一大挫敗；美國的角色將逐漸成為東亞區域政治權力的分享者、經貿事務的競爭者與軍事安全的監督者；東亞各國的自主能力大幅提高，而中國和日本將會主導東亞共同體的運作與發展事務，就如同德國與法國在歐盟的主導地位一般。雖然作者認為中日的角色日益重要，但是在中短期（五至十年）內，東亞共同體的運作與功能仍然是在摸索中緩步前進；至於歐盟的經貿整合程度，在可預見的將來，對東亞各國而言仍僅僅是一個目標而已。

貳、以往東亞各國組成區域經貿組織的訴求與困境

西歐各國在一九八〇年代的經濟整合，以及一九九〇年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失敗等因素使得東協各國警覺到全球經貿區域化的成形，並且提出各式各樣的對應方案。其實東協本身自一九七六年第一次巴里島東協高峰會後歷經一九八〇年代，就已經建立起一些區域經貿整合的初步機制。在聯合國專家的建議 (Kansu proposals) 之下，^②東協原始五國於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就成立了優惠貿易協議 (Preferential

註① 當時不只美中日三強不參與，連印尼也反對 EAEG，主要是基於當時東協各國經濟發展順遂，沒有必要另起爐灶，以及雅加達不願意此概念由馬來西亞所提出等因素。Asia 1992 Yearbook (Hong Kong: Review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pp. 153~154.

註② 聯合國專家團以土耳其著名學者 G. Kansu 和英國劍橋大學教授 E. A. G. Robinson 為首，從一九七〇初到一九七二年六月進行二年多的考察與研究，最後的報告被一九七六年的東協首度高峰會接納成為後來許多區域合作計畫的藍圖。Dewi Fortuna Anwar, *Indonesia in ASEAN: Foreign Policy and Regionalism*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4), pp. 65~66. 讀者可以注意到聯合國一九七二年的報告一直到一九七六年才被東協接納，主要是美國軍事力量自一九七五年撤出越南，使得東協警覺到新情勢來臨，才逐步走向區域整合之途。

Trading Arrangements, PTA)、東協工業互補(ASEAN Industrial Complementation, AIC)、以及東協工業計畫(ASEAN Industrial Projects, AIPs)、東協工業合作計畫(ASEAN Industrial Joint Venture, AIJV)等經貿整合機制,③起碼在形式上的合作,東協有初步的成效。

然而東協的合作被許多學者及專家批評為紙上文章,對於促進區域經貿整合並無幫助。以東協各國彼此間貿易占東協出口比重此一指標而言,一九八八年的比例是18%,甚至還低於一九七〇年的21.4%。如果排除新加坡這個轉口港,比例更是低到只有4%。④固然東協各國都是以天然資源和輕型工業為主,外銷到全球主要消費市場以賺取外匯,彼此間的需求反而不大。可是這樣如何談區域工業合作與經貿整合?會造成這種結果是許多因素互相影響所致。最重要原因是各國本位主義思維甚強,在國內相關企業或者產業獲利甚至生計遭受到威脅時,各國政府大都採取保護主義政策,棄區域整合於不顧。⑤因此往往只有一些沒有受到嚴重影響的產業才會降低關稅或者放開心胸參與合作計畫,那麼所謂的區域經貿整合成效可想而知。

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東協缺乏一個強大而且又有意願的私人企業群體參與東協內部經貿整合過程:私人企業的聲音在政策制定過程不被重視,只好在實施時向各國政府施壓;各國政府官員不論是基於選票或者是被利益團體影響所致,幾乎都站在維護本國產業利益立場發言,犧牲的自然只有區域經貿整合進程。雖然表面上東協有一個工商業商會的組織(ASE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ASEAN-CCI),作為表達工商業利益的工具。可是這些聲音在歷次東協年會的決策時都沒有受到足夠重視,因此這個組織只剩下維護各自利益的功用。⑥再加上絕大部分東協的私人企業規模不夠,缺乏走向整個東協市場的能力與意願,更不願意犧牲自身既定利益去成全一個更大的夢,才使得東協在走向區域整合時顯得步履蹣跚,效果不彰。

只是進入一九九〇年代,東協各國眼見GATT談判因為日、韓和歐洲共同市場一些國家不願意放棄對其國內農產品的高價保護政策而宣告失敗,馬哈迪總理隨即跳出來要建立東亞經濟集團。這構想受到區域內外各國程度不一的打壓或批評,馬國政府也因此改為更軟性的東亞經濟會議(East Asian Economic Caucus, EAEC),還是受到區域外一些國家的抵制,以至擱置一旁直到東亞金融風暴發生後才獲重視。另一方

註③ Narongchai Akrasanee and David Stife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EAN Free Trade Area," Pearl Imada and Seiji Naya, eds., *AFTA: The Way Ahead*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2), pp. 27~47.

註④ *Ibid.*, p. 32.

註⑤ 最好的例子就是馬來西亞和日本三菱(Mitsubishi)合作的國民車Proton以及印尼和南韓起亞(Kia)合作的國民車蒂汶(Timors)一事。馬哈迪前總理為了Proton的生存與發展幾乎是盡全力保護其國內市場;而印尼在國內壓力之下也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前夕製造出Timors。結果證明都無法達到最初的目標。Norman G. Owen e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Southeast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chapter 27, pp. 379~398.

註⑥ Narongchai Akrasanee and David Stifel, *op. cit.*, p. 30.



面，東協其他國家的決策人士則致力於東協自由貿易區（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的加速成形，其中又以泰國與新加坡政府的態度最為積極。當時泰國總理察猜（Chatichai Choonhavan）在提出把中南半島「自戰場轉為商場」之訴求普獲區域內外各國好評後，^⑦即積極推動 AFTA 進程。察猜總理在一九九一年二月不流血政變後下台，繼任的安南（Anand Panyarachun）仍持續推動 AFTA，並且在一九九二年的新加坡東協高峰會時獲得各國確認，將在 15 年內成立 AFTA，^⑧後來又推進到 10 年。不過後來 AFTA 的進程在面臨關稅減免談判時又陷入以往紙上談兵的模式：會議決議一堆，實質進展卻牛步。連馬來西亞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巴京達（Abdul Razak BAginda）都曾經無奈的表示「東協陷入言論與現實的矛盾中，過去我們談了許多合作，但是牽涉利益問題時，這些合作往往就被犧牲掉。」^⑨這種情形一直到東南亞金融風暴以後才大幅轉變。

除了東協各國，亞太區域的幾個主要國家也各自努力，建立起對自身最為有利的有形或無形之區域經貿體系。有形的以澳大利亞總理霍克（Bob Hawke）所倡導、美國大力支持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為主要動力。面對已於一九八九年成形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以及即將於一九九二年完成的歐洲共同市場（European Community, EC），全球區域主義已經就位，只剩下東亞這塊地區仍然沒有太大進展。澳洲政府倡議設置一個亞太政府間經濟合作組織的構想，獲得區域內多數國家之支持，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澳洲首府坎培拉召開首屆會議。^⑩中國、中華台北、香港於一九九二年正式加入，使得 APEC 成為亞太區域內包含最多國家或經濟體的經貿組織。一九九三年美國總統柯林頓倡議舉行非正式經貿領袖高峰會，再加上一九九四年的印尼茂物宣言，宣示已開發與開發中經濟體分別於二〇一〇年以及二〇二〇年達到貿易及投資自由化目標。^⑪

如果上述目標可以順利達成，APEC 自然是東亞區域各國可期待的經貿合作組織。不過 APEC 的一些特性使得這些理想不容易實現。最主要一點是各國在坎培拉會議時即確立之原則：亞太區域之合作應該採取對外開放（outward looking）而非防禦性質，以及以合作諮商方式達成共識。在 APEC 所奉行的一套具自願性、共識決與非約

註⑦ 察猜前總理因緣際會正逢冷戰結束和越南宣布自柬埔寨撤軍之大環境，他上台後即採取積極主動與自主的外交政策，包括降低對美國軍事的依賴、增加對中共與蘇聯的接觸、以及打開中南半島的商業契機等等。Clark D. Neher, *Southeast Asia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Era*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1), p. 15.

註⑧ 有關 AFTA 的詳情，參閱 Pearl Imada & Seiji Naya, eds., *AFTA: The Way Ahead*.

註⑨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Oct. 16, 1997, p. 16.

註⑩ 有關 APEC 之成立與運作，參閱 Richard Higgott, "APEC: A Sceptical View," Andrew Mack & John Ravenhill, eds., *Pacific Cooperation* (St. Leonards, NSW: Allen & Unwin Australia Pty Ltd., 1994), pp. 66~97.

註⑪ 有關 APEC 的成長過程，可參閱林欽明，「APEC 十年的回顧與展望」，*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22 卷第 12 期（民國 88 年 12 月），頁 13~16。

束性三項特質之決策過程下，^⑫ APEC 僅僅是一個年度性區域經貿論壇，根本無法提供參與國足夠的誘因或約束力量以達成貿易及投資自由化的遠景。這些弱點在東南亞金融風暴時完全暴露出來，令受創各國失望不已，轉而另起爐灶，重新慎重思考建立區域經貿整合機制，以防禦國際游資大幅攻擊的可能性。

日本則是積極往建立無正式形體的「日元經貿區」的目標前進。挾著強大的經濟與科技力量，日本其實自一九六〇年代就提出區域經貿合作機制。一九六五年日本著名教授小島清（Kojima Kiyoshi）提出「太平洋自由貿易區」（Pacific Free Trade Area, PAFTA）及太平洋經濟共同體（Pacific Economic Community）的構想，並促成非官方的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 PBEC）於一九六七年首度舉行。^⑬其後隨著日本經濟力量日益強勢，一九八〇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Masayoshi Ohira）與澳洲總理弗雷賽（Malcolm Fraser）達成協議，共同舉行首次的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更進一步將非官方升級為半官方層級的合作模式，也為後來的部長級APEC奠下良好基礎。^⑭

不過日本要促成以日本或日元為主的經貿區也有心理與實質上的困難。日本在二次大戰時期占領東南亞各國，號召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陰影仍然讓東亞各國心懷疑慮。再加上日本自一九六〇年代持續在東亞及東南亞各國透過投資、貿易與經濟競爭行為，早就成為東南亞各國的經貿主導者。可是日本企業嚴重剝削當地天然資源以為己用，留下一堆污染環境禍害之作法，也引來許多的批評與反感。東南亞各國有識之士與整個社會的反日情緒早在一九七四年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Kakuei Tanaka）訪問東協各國時，普遍受到示威與暴動對待即可知。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一九八八年的評論就很明白表達許多東亞國家領袖的心聲：沒有一位東亞國家領袖贊成日元集團，那是一大退步（No leader in the East favors a yen bloc. It would be a retrograde step.）^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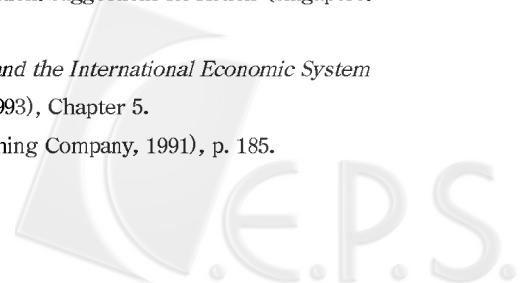
因此在爆發東南亞金融風暴以前，不論是東協各國、澳洲或日本都不把區域經貿整合的進程看做當務之急；大家仍然各行其是，以自身利益為主要思考方向。歐盟模式的經貿整合需要參與者付出部分的金融與經濟主權，在沒有危機出現以前很難說服東亞各國犧牲自身部分主權去成就一個更高理想，尤其這些國家當時都是處於經濟發展最順遂的時期。至於東北亞的其他幾個經貿大國——中國、南韓與台灣，都是國家主

註⑫ 林家如，「台灣參與 APEC 之政經意涵與策略」，李瓊莉、徐遵慈編，*APEC 與兩岸關係發展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1年），頁43~45。

註⑬ 相關資料可參閱John Crawford ed.,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Suggestions for Action* (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81)。

註⑭ Fred Bergsten & Marcus Noland, eds., *Pacific Dynam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3), Chapter 5.

註⑮ Nigel Holloway, *Japan in Asia* (Hong Kong: Review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p. 185.



權論的實施者。^⑥這幾個政府對於各自國內金融體系的掌控一向嚴厲，也利用全球市場經濟賺取大幅外匯以支應國家經濟發展，提昇人民生活水準與投資國內工商業的需要。在十分滿足於當時經濟發展的情形下，他們自然不會把區域經濟整合的進程當做一回事。

金融風暴後的省思

一九九七年七月爆發的東南亞金融風暴，很快的對整個東亞各國造成極為嚴重的打擊，在此茲不贅述。最讓區域內各國政府傷心的是這些區域經貿組織不論是東協、APEC、AFTA 等等，在面臨金融危機時都似乎只是空殼子，眼見國際外匯投機客橫掃東亞而束手無策。加上一向是東亞經濟火車頭的日本經濟，從一九九〇年以來就陷入自二次大戰以後最嚴重的泡沫經濟崩盤，無法帶動東亞經濟的復甦；^⑦而香港政府在中國大陸的支持下成功反擊國際外匯投機客之事實，以及馬來西亞政府採取管制外匯政策因而穩住該國經濟等事例，均使得區域內各國菁英重新思考如何面對國際新局勢以及未來經濟發展方向。從泰國、印尼、中國大陸、香港、南韓到馬來西亞，絕大多數的有識之士認為這些國際投機客要負最大責任，然而東亞地區沒有建立起一個有效率經貿體系亦難辭其咎。更進一步來說，未來的區域經貿體系一定要能夠忠實反映區域各國的經貿需要，而不是代表美國或者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在東亞的利益。^⑧在這種思維下，類似馬哈迪總理以前所倡導的東亞經貿體系又獲得各國重視。^⑨

另一方面，長期陷入經濟蕭條的日本政府亦逐漸改變以往的觀念，轉而接受區域合作的概念。在日本經濟發展順遂時期，東京朝野的目標放在全球市場，日本主流學者專家所擁抱的是全球主義。日本三菱綜合研究所在一九九〇年出版的報告即說明「日本企業加速行之多年的全球化侵略……企業的全球化戰略將消弭匯率變動所造成的殺

註⑥ 有關南韓和台灣的模式，請參閱 Stephen Haggard,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8, No. 2(Summer 1984), pp. 343~370; Cal Clark, "The Taiwan Exception: Implications for Contending Political Economy Paradig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1, No. 3 (September 1987), pp. 327~356.而中國大陸從一九七八年採取改革開放政策以來，處處可見台灣和南韓發展模式的軌跡；三者都是壓制政治而在經濟方面採行保護主義以促進外銷、賺取外匯為主。

註⑦ 不只經濟，甚至政治及外交方面的領導能力都受到東南亞國家的嚴厲批評。李光耀就在一九九八年二月時批評日本在東亞區域事務上的領導角色已經是過去式。*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Feb. 6, 1998, p. 1.

註⑧ *The Economist*, Nov. 7, 1998, p. 20.

註⑨ 除了外來影響之外，原本東協內部主要反對者印尼總統蘇哈托自己亦逃不過經濟動盪所導致的社會騷動，於一九九八年五月被迫下台。後繼者如哈比比 (B. J. Habibie.)、瓦希德 (Wahid Abdurrahman) 等人面對當時印尼受到金融風暴衝擊、內外交迫的政經環境，已經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反對東亞經貿體系的建立。另一方面，當時新上任的東協秘書長 Rodolfo Severino 在積極鼓吹歐盟模式經貿整合時，也不像金融風暴以前受到各國的忽視。Francois Godement, *The Downsizing of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189.

傷力」。^①然而自泡沫經濟破滅和金融風暴以後，日本朝野在徬徨中漸漸了解到區域合作的重要性。日本外貿振興會會長、前通產省副相白田山登就指出：日本準備面對事實，放棄長期以來抗拒與主要亞洲夥伴組成地區性自由貿易協定的態度。^②而日本通產省的一九九九年度報告就提議東北亞成立一個自由貿易區，包括日本、香港、南韓與台灣，目的之一是擴大日本在全球貿易協定談判上的影響力。^③此議雖然因為南韓與香港反應冷淡而胎死腹中，已經顯示出日本對於區域經貿整合的態度。

中國也在金融風暴後改弦更張，走向區域合作之途。從開放改革到東亞金融風暴的十餘年間，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是吸引外資、逐漸建立起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經濟體系、以及如何改革超過十萬家的公營企業。^④中國執政者很清楚在還沒有建立起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前，中國根本沒有餘力放棄部分經濟主權以加入區域整合計畫。馬哈迪一九九〇年所提出的東亞經濟集團計畫就被北京方面認為不切實際而不支持。

不過中國能夠安全渡過金融風暴第一波之衝擊使得中國信心大增，也看出東亞區域經貿整合的需要。一九九八年四月，中共當時財政部長項懷誠在世界銀行和IMF發展委員會會議上即指出，東亞金融風暴不意味著對亞洲各國經濟發展道路的否定。相反的，它將促進亞洲經濟發展的自我改進。風暴過後，亞洲將會建立起更加有效的經濟體系。^⑤此後中日韓三國元首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於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舉行首次高峰會談，就三國經濟貿易合作達成協議。隨後中國更趨積極，中國總理朱鎔基在二〇〇〇年提議就中國與東協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進行研究。類似言論與具體行動，在在顯出中國大陸亦體會到全球區域整合的發展趨勢。

叁、東亞共同體的發展

除了金融風暴迫使東亞各國重新思考未來經濟發展方向以外，國際金融組織如IMF和世界銀行的不當對策與美國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以後的強勢反應也間接促成東亞區域意識的高漲。其實IMF在金融風暴爆發前就曾經一再警告泰國經常帳赤字太高，會導致經濟失衡，只是誰也沒料到情況會失控到如此嚴重。^⑥金融風暴從一九九七年七月二日自泰國爆發以後，迅速蔓延東亞各國。國際金融組織並沒有袖手旁觀，提供泰國、

註① 日本三菱綜合研究所著，日本文摘編譯中心譯，全預測 90 年代的日本（台北：故鄉出版公司，民國 79 年），頁 12~14。

註② 大公報（香港），1999 年 2 月 11 日，版 C3。

註③ 中國時報（台北），民國 88 年 5 月 22 日，版 1。

註④ Frank Ching, *China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Review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p. 56.

註⑤ 文匯報（香港），1998 年 4 月 19 日，版 25。

註⑥ Callum Henderson, *Asia Falling?* (Singapore: McGraw-Hill Book Co., 1998), p. 240.

南韓和印尼總共超過一千一百億美元的資金（實際到位的金額截至一九九八年四月為止約為三百六十餘億美元），^⑥不過這些治標的作法僅僅暫時穩住這些國家的金融情勢，東亞整體經濟與金融情勢仍然不見起色。甚至世界銀行的主要經濟專家如二〇〇一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利茲（Joseph E. Stiglitz）還和IMF的高級官員因採取不同對策而互相嚴厲批評。^⑦

到一九九八年中時，東亞各國的經濟與金融狀況遭到第二波襲擊，迫使一些國家採取不同對策因應。眼見馬幣ringgit持續貶值，經濟狀況沒有改善，馬來西亞政府採取斷然措施，宣布關閉外匯市場，把馬幣釘住3.8兌1美元的政策，反而因此穩住馬國經濟。^⑧另外香港外匯及股票市場在一九九八年六月時遭受國際投機客索羅斯（George Soros）等人的刻意打壓，準備把恆生指數從九千點附近攪壓到六千點再行獲利了結。^⑨只是香港的金融管理局（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HKMA）在北京政府的支持下，運用超過一百五十億美元資金拉抬股市，把股市維持在七千八百點之上，迫使國際投機客暫時退出亞洲。^⑩香港金管局的干預行動引來包括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 Board, Fed）主席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公然批評，^⑪卻博得許多東亞國家大聲喝采。馬來西亞和香港政府不採取IMF所認同的對策分別建功，顯示出IMF的處方並不能解決各國的問題。中國政府在東亞金融風暴時的穩健做法與適時的嚴厲反擊，不僅獲得東協各國的認同，也間接促成後來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區的形成。

更嚴重的因素應該是美國在受到九一一事件以後的強勢反應，讓東南亞為數超過二億回教徒認為是基督教再一次欺負回教，^⑫轉為拉攏較溫和的佛教國家並把基督教

註⑥ Francois Godement, *The Downsizing of Asia*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77.

註⑦ 史提格利茲和IMF之deputy director費雪爾（Stanley Fischer）的論戰，還代表兩個機構的不同思維：IMF是以確保國際金融體系的安全為主；而世界銀行則從更宏觀的角度（包括社會與政治穩定）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史提格利茲對IMF的嚴厲批評可以參閱他所著*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2)中第四章“The East Asia Crisis: How IMF Policies Brought the World to the Verge of a Global Meltdown”。

註⑧ *Asia 1999 Yearbook* (Hong Kong: Review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pp. 157~159.

註⑨ 有關此次股匯市攻防戰的詳細情形，參閱趙文明、靜炎主編，*索羅斯空襲香港*（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9年），頁137~185。

註⑩ *Asia 1999 Yearbook*, p. 117.香港能夠成功拉抬股匯市，是她和中共加起來超過二千二百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以及當時索羅斯被俄羅斯市場套牢等因素。

註⑪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Sep. 17, 1998, p. 2.

註⑫ 回教社會對美國以至於基督教國家的批評最具份量的學者應該屬立場溫和的薩依德（Edward W. Said），他在*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一書中從宏觀角度分析與批評美國帝國主義對於開發中國家的惡質掌控，並不因為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而稍減。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New Century Publishing, 1993), pp. 533~564.

國家排除在區域整合進程之外。美國在遭到九一一攻擊以後，固然有一些激進的回教信徒叫好，大部分的回教徒是同情美國。不過美國布希政府隨後嚴格監控中東與東南亞回教組織的資金流通狀況，^③以及在攻克阿富汗之後趁勢咬住伊拉克不放，以各種說詞做爲攻打伊拉克的藉口；最後還不顧德法俄中等國的反對，在沒有聯合國的授權下逕行攻打伊拉克。美國占領伊國後卻找不到當初所說的儲藏或生產大規模毀滅武器，幾乎坐實回教社會的指控，認爲美國只是爲了伊拉克豐富的石油蘊藏而攻打伊拉克。再加上美國國內一些所謂的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ve）人士在布希政府裡掌握許多決策性位置與發言權，^④以及許多基督教福音傳道教派（evangelical）人士的反回教言論，使得全球回教社會爲之譁然。他們大都認爲美國在九一一事件後把整個回教社會當成假想敵，回教社會應該團結起來對抗美國帝國主義，而所謂的基本教義派人士更主張以發動聖戰（jihad）方式回擊美國。^⑤在這種氛圍下，東南亞國家的排他性東亞共同體訴求是受到許多當地媒體與人民的支持。

其實美國布希政府上台以後即在外交政策上採取一連串強勢作爲，包括宣布不遵守全球大多數國家開會所通過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阻止南韓金大中總統與北韓政府和解的陽光政策、單方面退出美蘇一九七二年所簽訂的反導彈飛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 ABM）以及堅持建立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NMD）等，都令各國爲之側目。尤其是發生在二〇〇一年四月初美國偵察機和中共 F-8 攔截機相撞事件，雙方僵持長達十一天，造成遠東經濟評論以聳動的「冷戰 2：美國和中國」（Cold War 2：The U.S. and China）做封面標題，^⑥一時之間彼此似乎又回到冷戰時期的思維。美國政府隨後即宣布賣八艘潛水艇以及其他先進武器給台灣，還有布希總統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美國將儘一切可能防衛台灣等言論，都使得中共驚怒交加。很自然的，那段期間是美台關係最爲順暢的階段。

美中關係在九一一事件以後峰迴路轉。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政府迅速立下全球反恐

註③ 印尼一個十分著名的基金會 Al Azhar Foundation 即嚴厲批評美國作法：“The U.S. has no right to control us...We don't accept this thinking that Muslims are terrorist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 15, 2001, pp. 22~23.

註④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也是知名經濟學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甚至用「革命勢力」（revolutionary power）來形容包括美國副總統錢尼（Dick Cheney）、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國防部次長伍佛維茲（Paul Wolfowitz）等重要決策人士的全球戰略思維。他們對目前全球現狀不滿，主張所謂的布希主義：美國力量將會積極用在全球大多數地方（...the “Bush doctrine,” in which U.S. power will be used aggressively in much of the world). Paul Krugman, *The Great Unraveling: Losing Our Way in the New Centu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4), pp. 5~9.

註⑤ Judith Miller, “The Challenge of Radical Islam,”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2 (Spring 1993), pp. 43~56; Daniel Pipes, “There Are No Moderates-Dealing with Fundamentalist Islam,”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41 (Fall 1995), pp. 48~57.

註⑥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 12, 2001, p. 1.不過 *FEER* 一貫的強烈反中和親美論點常引起東南亞國家和中國的批評與抵制，銷路受到影響，最後在去年底從周刊改爲月刊形式。

作戰為其主要戰略，在這大戰略下美國必須重新基於地緣戰略在全球各地建立軍事或者情報資訊收集基地，^⑦更以實際行動在東南亞開闢第二反恐陣線。^⑧而中國絕對是美國全球反恐戰略中極為重要的一環，美國已經沒有餘力同時對付超過十億人的回教社會與十三億人的中國，只好把最為迫切解決的反恐作戰列為優先。另一方面，中國朝野在檢討對美政策失誤以至於雙方關係陷入低潮之後，^⑨也立即利用在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第一時間支持美國的全球反恐戰略，而使雙方重新回到異中求同的合作關係。

雖然美中關係改善，中國還是利用美國和全球回教社會的互相猜疑與矛盾成功拉攏東協各國。當美國利用攻占阿富汗機會成功在中亞的吉爾吉斯（Kyrgyzstan）和烏茲別克（Uzbekistan）建立軍事及情報資訊收集基地，^⑩又倡言在東南亞區域建立第二反恐陣線，還希望利用圍剿菲國叛亂組織機會重新在菲律賓駐軍的時候，^⑪突然讓中國的戰略專家警覺到有可能被美國軍力東西兩面包夾的危機。以往中國把新疆、甘肅等地當做國防戰略大後方，不論是航天工業、核子試爆、洲際飛彈等國防戰略基地都部署在此區域，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離開美國在東亞軍力部署有超過三千公里的國防戰略縱深。可是自從美軍進駐中亞，這些戰略大後方有一變成爲國防第一線的危險。再加上美軍如果成功在東南亞建立起第二反恐陣線以及原有東北亞駐軍的調整與強化，^⑫中

註⑦ 美國在九一一事件以後所得到的最大教訓之一是：美國不可能從東南亞、經南亞、中亞到西亞如此廣大範圍內毫無駐軍，而保護美國本土的安全，因此重新採行全球地緣戰略的美軍，即順勢利用攻打阿富汗之便，進駐中亞國家，分別在烏茲別克和哈薩克等國建立前進基地。<http://www.latimes.com/news/nationworld/world/la-fg-asiami129may29000425,1,27668.story>.

註⑧ 包括協助菲律賓政府圍剿南部的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回教叛亂組織，對印尼軍方態度從九一一事件前的抵制（美國國會所通過的決議）轉爲拉攏，以及在印尼蘇拉威西（Sulawesi）島北端的比通（Bitung）港建立海港以供美國海軍艦艇停泊等。美國在次年七月的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會議時，即和東南亞國家簽署反恐聯合聲明。可是部分東協國家質疑，這項美國力主的聯合聲明，可能造成美軍進駐東南亞，干預各國主權與內政。<http://www.nytimes.com/2002/12/01/international/asia/01FILL.html>。以及聯合報，民國91年7月29日，版12。

註⑨ 根據作者和中國一些和官方較接近的學者之訪談，他們大都認爲北京方面對此事過度反應，以後如果有類似狀況絕不會再如此激進，導致雙方關係陷入最低潮。

註⑩ *Washington Post* 形容美軍進駐中亞是「自亞歷山大大帝（西元前329年）以後西方軍隊首度在此區域活動」。Robert G. Kaiser, "U.S. Plants Footprint in Shaky Central Asia," *Washington Post*, Aug. 27, 2002, p. A01.

註⑪ Elisabeth Bumiller, "Bush Affirms U.S. Is Ready to Send Troops to the Philippine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1, 2003, p. 1.其實菲律賓在九一一事件後艾若育（Gloria Macapagal-Arroyo）總統就是美國反恐作戰的最大支持者，只是受到國內民族主義與左派份子的反對而作罷。*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 6, 2001, pp. 24~25.

註⑫ 這些調整包括在2008年前將駐韓美軍減少三分之一至2.45萬人，並將駐守在漢城市中心以及附近的第二機械化步兵師撤退到韓國南部，以免成爲戰爭時的主要目標。這是美軍計畫將從歐洲及亞洲撤出十萬駐軍的一部分。不過這不是弱化美軍在東亞的兵力，相反的美軍的目的旨在提高快速反應能力，以應付新的東亞態勢。這些包括日本在沖繩部署F-15戰鬥機部隊、美國海軍在關島部署三艘洛杉磯級攻擊核子潛艇等。參閱「駐韓美軍爲何進行二戰以來最大規模調整」，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4-12/17/content_401012.htm.

國豈不是陷入美國「新圍堵政策」的威脅之中？^③

基於前述戰略考量，中共很快就做出拉攏東協以在東南方打出一個戰略缺口的政策。^④因此我們看到在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勢力順勢進入中亞，中國更積極推動和東協的自由貿易區：在當年底的東協區域論壇上中國向東協示好，以更優惠條件包括對於東協幾個較落後國家提供某些產品可以享有單方面自由出口到中國市場等等，吸引東協同意和中國共組自由貿易區。至於東協各國原於金融風暴後即制訂「區域聯防」的對策，積極倡導和東北亞的日本、中國和南韓共組區域經貿體系。^⑤東協本來一直向東亞經濟盟主日本提議共組自由貿易區，卻因為日本國內農牧業團體強烈反對而推拖不前。^⑥北京趁機抓住此一機會向東協釋放善意，雙方遂一拍即合，宣布在二〇一〇年組成自由貿易區。隨後中國更放低身段，和東協領袖共同簽署「南海週邊國家行為宣言」，為雙方在軍事安全合作與消除彼此疑慮上建立良好互動。^⑦

其實從東協各國的角度而言，中國的刻意拉攏有時候反而可以被用來迫使日本接受東協需求的絕佳工具。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共組自由貿易區一事。日本政府原先因為國內農牧業反對而一再推拖，令急於尋找鄰近經貿大國支撐的東協十分無奈。可是當中國於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在柬埔寨首都金邊所舉行的東協高峰會，和東協共同宣布將於二〇一〇年之前共組自由貿易區後，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Junichiro Koizumi）第二天就和東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宣言。^⑧如果不是中國先簽的因素，日本不知道到什麼時候才會同意組成東亞自由貿易區。其他如誘使中國及日本簽署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TAC）也循此模式達成。以前當日本經濟獨霸東亞時，東南亞各國只有接不接受兩種選擇，東南亞國家那種既需要日資又害怕受掌控的心態可想而知。等到中國經濟日益強大，東南亞各國反而能夠採取以中制日或者以日制中的雙槓桿操作。從這個角度而言，東協可能還是利用中日兩國競爭關係而從中取利的最大贏家。

美國攻打伊拉克一事更強化東南亞國家加速與東北亞國家的經貿整合。美國不願

註③ 不只中國有此顧慮，俄羅斯也面臨北約東擴及美軍進駐中亞的嚴厲挑戰，因此中俄雙方將在今年九月舉行首次雙邊聯合軍事演習，俄羅斯方面會讓最先進的戰略轟炸機與戰鬥機 Su-27SM 參與演習。中俄首次聯合軍演的主要目的就是對付美國挑戰，拓展戰略空間。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5-03/08/content_422891.htm.

註④ 從圍堵政策的角度而言，要能夠成功達成圍堵的目標，軍事與經濟的圍堵是密不可分的二大工具。現在中國大陸如果能夠和東協成立自由貿易區，達到商品、服務、資本及勞力等自由流通的目的，則美國要圍堵中國勢必不能夠成功。http://www.asianewsnet.net/template.php? No=6992&logo_name=Columus/Analysis&Sec...2002/10/19.

註⑤ Francois Godement, *The Downsizing of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Chapter 7.

註⑥ <http://www.nytimes.com/2002/12/06international/asia/06ASIA.html>。日本政府的外務省贊成和東協的自由貿易區，農林省和大多數非都會地區產生的國會議員則強烈反對。

註⑦ 雖然有些東協國家的戰略專家仍然質疑，中國並沒有真正在南海主權問題上做出讓步，但中國的善意已經獲得東協各國普遍的肯定。*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 14, 2002, p. 26.

註⑧ <http://www.nytimes.com/aponline/international/AP-ASEAN.html>. 2002/11/6.

德法中俄等國的反對，繞過聯合國而自組聯軍順利攻下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並不出各方意料之外。倒是美國占領伊拉克之後並沒有找到當初所指控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伊拉克的反抗勢力也一直聲勢浩大，造成眾多美軍的傷亡，在在使得美國攻打伊拉克政策的合法性受到其他國家的質疑，^④全球的回教社會更是一面倒的批判美國的帝國主義作風。^⑤尤其是美國媒體報導攻打伊拉克是九一一事件過後沒多久，美國政府最高層決策核心就擬定的軍事計畫；^⑥而所謂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或者海珊政府和回教凱達（al Qaeda）恐怖組織有勾結等等，只不過是後來美國政府為開戰找來的藉口而已。這些報導使得回教社會輿論大肆批評，認為美國政府攻打伊拉克不是為了石油資源，就是要推翻回教社會的現狀。^⑦在美國這種強勢作為下，東協各國普遍有建立東亞共同體以對抗美國的看法，而中國正好是可以拿來制衡美國過份強勢作為的工具。^⑧

肆、東亞共同體的影響

在去年十一月的東協高峰會時，中共總理溫家寶和東協領袖簽署貿易協定，同意在二〇一〇年前消除關稅之商品。溫家寶還簽署安全戰略宣言，承諾不以武力方式在東南亞地區解決問題，其中還包括南中國海有爭議的區域在內。透過這些文件和宣言，中國大幅強化和東南亞國家間的經濟和外交關係。雙方關係的改善可以從東協官員在論及中國的用詞而看出。從冷戰時期到九〇年代初期，中國是被東協六國認為負面的「威脅」（threat），中國共產黨在冷戰時期一直都沒有放棄對於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的合作與援助關係當然是主因之一。因此在那時期各國都願意配合美國對於共產國家的圍堵政策。^⑨而當時越南、柬埔寨、寮國與緬甸等國都還沒有加入東協，同質性較高的東協也比較能夠維持所謂的「共識決」之決策模式。

註④ 連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在美軍攻打前幾天都嚴詞警告，美國避開聯合國授權逕行攻擊伊拉克，會違反聯合國憲章。Patrick E. Tyler and Felicity Barringer, "Annan Says U.S. Will Violate Charter if It Acts Without Approval," *The New York Times*, Mar. 12, 2003, p. 1.

註⑤ Jane Perlez, "Americans Abroad Cope With Anger at U.S.," *The New York Times*, Feb. 19, 2003, p. 1.

註⑥ Bill Keller, "The Sunshine Warriors," *The New York Times*, Sep. 22, 2002, Sec. 6, p. 48.另外有關美國布希政府內部強烈主張逕行攻打伊拉克之集團人士與背景說明，參閱Fumio Matsuo,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Jap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7, No. 3, Fall 2003, pp. 201~217.

註⑦ 以美國911報告為例，它就建議美國外交政策應該重新思考如何在回教世界破壞回教恐怖組織的財務鏈，以及這些組織向當地社會吸收新血的能力。這份報告特別指出印尼和菲律賓一些小島可能被用來做為訓練基地。David E. Sanger, "Threats and Responses: International Issues; Reports Urges New Strategy On Muslim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3, 2004, Sec. A, p. 11.

註⑧ Bill Keller, "The Chinese Century,"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04, 2004, Sec. 6, p. 24.

註⑨ 印尼直到冷戰結束以後才和中國復交一事，即可反映雅加達政府對於以往中共不肯宣布放棄支持印尼共產黨的疑慮。至於「威脅」一詞，參見Michael R. J. Vatikiotis,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199.

自從冷戰結束，尤其是中國因為天安門事件受到國際社會的制裁與打壓後，北京政府開始對東協各國與東南亞華人下功夫，包括明白宣示不再支持東南亞各國的共產黨，參加東協所主辦的東協區域論壇ARF和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等官方或二軌對話機制以促進雙邊對話，以及雙方簽署合作協議，共同開發湄公河、瀾滄江流域和共同建設泛亞鐵路等計畫，雙方關係逐漸改善。^⑤九〇年代中期尤其是東南亞金融風暴以後，眼見中國在金融風暴中力挺人民幣，避免東亞另外一波金融風暴，以及在香港股匯市修理國際外匯投機客等事蹟，再比照美國政府的近乎袖手旁觀、日本政府的有心無力，東協各國點滴在心頭，已經在用詞上逐漸把中國認為是比較中性的「挑戰」（challenge），疑慮之心漸減而期許之心日增。

進入本世紀以來，一方面中國的經貿實力大增已經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另一方面美國在九一一事件以後和回教社會產生實質變化，都讓東南亞各國菁英感到有必要調整東協對這幾個大國之關係。因此東協內部經過一連串的討論後做出政策調整：當東協各國原則同意和中國成立自由貿易區以後，即把中國改為更正面的「機會」（opportunity）與「挑戰」並用之詞。^⑥短短十年間東協對中國的用詞，從「威脅」、「挑戰」、到「機會」，有如此大的變化，固然可以看出中國在拉攏東協各國之用心，也顯示出東亞區域政經情勢之快速變動，以及東協各國在應付這些變局時所設計的整體規劃。

東協對於東亞共同體的期望

從宏觀戰略角度而言，東亞共同體反映出東協思考未來五到二十年之間，東亞如何和平容納一個經濟以及軍事力量日益強大的中國。根據印尼著名戰略學者林棉基（Jusuf Wanandi）的說法，未來的東亞共同體有三大戰略目標。第一是建構一個區域組織可以讓中國在其中扮演建設性角色，還能夠讓中國成爲一個願意接受維持現狀（a full status quo power）的成員。其次是協助中國和日本在東亞共同體的正常性關係，以及兩國在東亞共同體內的領導者角色。第三是協助減輕未來美中之間可能發生的衝突，尤其當未來二、三十年內中國極可能成爲一個區域或者全球性的強權時。^⑦

當然要達到這些目標是很不簡單的任務，其中日本被東協各國寄以厚望，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日本一方面要在經貿領域上讓出一部分主導權，和中國成爲持續推動東亞經濟發展與財經整合之共主；另外一方面日本又要以美國在東亞最密切的盟友身分，說服美國接受東亞共同體的形成，以及此一經濟體並不違反美國在東亞的利益。至於東協和南韓則擔任催化劑的角色，努力調合與促成中日兩國在東亞共同體這個框架內

註⑤ 另外一個因素是東協在九〇年代積極把越南、寮國、柬埔寨和緬甸等共產或軍事集權國家拉入組織，而這些國家大部分和中國十分友好，願意幫中國講話。

註⑥ *The Nation* (Bangkok), Oct. 19, 2002, p. 6; *The Daily Yomiuri*, Mar. 11, 2003, p. 2.

註⑦ Jusuf Wanandi, "Challenges to the East Asian Community and the Moves Forward," *The Indonesian Quarterly*, Vol. 32, No. 2, 2004, pp. 111~112.

的合作。^⑧

東協也知道要達成這些目標的困難度，尤其是中國與日本彼此間對於釣魚台群島領土爭議、二次大戰歷史的解釋以及和軍事力量的擴充一直抱著猜疑之心，並沒有因為經貿整合而稍減。^⑨因此東協的區域整合規劃是採取階段性做法：先從比較自然與簡單的經濟貿易方面整合，等到參與者建立信心以後再逐漸往更複雜的政治與安全領域發展。以貿易額而言，二〇〇四年中國和日本的雙邊貿易額超過一千六百八十億美元，比前一年增加 27 %；中國取代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國，彼此間的經貿關係也錯綜複雜的遠遠超過以往常用之誰壟斷誰情形。^⑩是以即使日本近期在軍事安全上透過美日安保條約的擴張解釋，警告中國不要破壞台灣海峽兩邊之現狀，日本和中國還是願意加入東協所規劃的區域整合模式。原因無它，經貿的現實利益迫使雙方合作。東協很了解這點，因此以一個超過二十億人口的市場為餌，先後誘導中日兩國加入東亞共同體。

東協各國願意放棄以往所堅持的以東協為主體之區域經貿甚或政治及安全機制，轉而尋求東協以外的經濟大國進行經貿整合，一九九七年金融風暴橫掃東南亞的慘痛經驗無疑是主要因素。東協以及東北亞各國從金融風暴中得到一個最大的教訓是：如果經貿全球化是各國商品對外攻城掠地的最佳利器，那麼面對全球化所帶來之巨額資本自由流通而產生的負面衝擊，區域經貿整合就是必備的防禦武器。^⑪目前每天在全世界各個資本市場流動的資金總額超過一兆五千億美元以上，^⑫這麼龐大的游資如果要襲擊某一個國家的股匯市，絕對不是一般中小型國家的一、二百億美元外匯存底所能抵擋的。東協經此教訓，下定決心要犧牲部分經濟與金融自主權以尋求集體防衛機制。

在東亞各國領袖逐漸產生共識的氛圍下，「東協加三」即發展出一些財經合作機制，首先是二〇〇〇年五月的財政部長會議達成的「清邁倡議」（Chiang Mai Initiative, CMI），與會各國同意在成員國之間建立區域的「雙邊互換安排」（Bilateral Swap Arrangements, BSAs）網絡。到二〇〇三年底，中日韓三國與東協原始五國已經締結 16 個雙邊互換安排，達到 440 億美元。^⑬加上東協十國各提出的 10 億美元，總額超過 450 億美元。其他金融監督機制如區域內的金融和財政監督組織「東亞暨太平洋地

註^⑧ *Ibid.*, pp. 112~114.

註^⑨ James Brooke, "Japan's Ties to China: Strong Trade, Shaky Politics," *The New York Times*, Feb. 22, 2005, p. 1.

註^⑩ 固然日本企業的科技研發能力及行銷手法遠超過中國企業，大多數日本企業還是利用中國大陸的廉價勞力以維持其全球競爭力。這也是前註之《紐約時報》文章認為日本在經濟上日益依賴中國的主因。

註^⑪ 參閱金榮勇，「亞洲金融風暴與東亞經濟安全體系之建立」，《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1 期（民國 89 年 1 月），頁 1~14。

註^⑫ Richard C. Longworth, *The Global Squeeze* 應小端譯，*虛幻樂園 全球經濟自由化的危機*（台北：天下遠見出版社，2000 年），第一章。那只是九十年代的數目，現在每日更是超過二兆美元。

註^⑬ 參閱孫國祥，「東亞區域整合之演進與願景：經貿、金融與安全面向的探討」，《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6 卷第 1 期（2005 年 1 月），頁 138~141。

區中央銀行首長會議」(Executives Meeting of East Asia- Pacific Central Banks, EM-EAP) 和「東協監督進程」(ASEAN Surveillance Process) 亦在運作中；還有東亞各國所積極發展的「亞洲債券基金」(Asian Bond Fund, ABF) 也在泰國於二〇〇二年提出後逐步進行。^④甚至東亞各國代表暢談東亞單一貨幣亞元的遠景。似乎東亞區域財經整合箭在弦上，前途一片大好。

只不過東協各國以往財經合作多數是紙上談兵，不肯真心放棄自身的部分財經主權，才會在金融風暴時毫無抵抗能力。現在東亞財經整合機制，有日中韓三強的加入，實力固然大增，也達成一定嚇阻國際投機客的作用；然而類似的整合機制是否會造成所謂的道德風險危機 (moral hazard)，或者有些國家刻意隱瞞財經數字，仍然有待再一次金融或經濟危機來臨時的檢驗。^⑤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未來東協與日本或者中國組成自由貿易區的前景為何？以東協絕大部分的本土或者民族企業都屬於中小型規模而言，不論和日本或華人企業進行整合，都將會面臨一場生死存亡的淘汰賽，而且存活率不會很高。屆時因為經貿整合所產生的企業倒閉、失業人口增加、日資與華資掌控東協經濟等問題勢必會轉變成政治與社會問題，再回過頭來牽制整個東亞經貿整合的進程，一直到各會員國之間取得某種程度的妥協與共識才會繼續往前進。順著這個邏輯，我們可以瞭解東亞經貿整合的過程將會是一段崎嶇不平的道路。影響整合進程速度的最主要動力可能還是來自於外部的壓力，包括重大經濟或金融危機，而各國的執政者往往扮演著拉扯的角色。

美國角色的轉變

如果東亞共同體可以順利如東協各國和中國所希望的在未來十年成形與初步運作，絕對是美國亞太外交政策的一大挫折。美國在東亞區域的角色，可能會從二次大戰以後的政經與軍事之絕對主導者，逐漸蛻變為東亞區域政治權力的分享者、經貿事務的競爭者與軍事安全的監督者。^⑥東協與中國早就看出全球逐漸走向三大經貿板塊：擴大後已經擁有二十五個國家的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未來可能再加上中美及南美而擴大成為美洲自由貿易區）以及東亞共同體（未來可能包含印度及鄰近國家）。歐洲的經貿整合經過十數年的發展與磨合後，所爆發出來的經貿動能與外交自主性，更是

註④ Agus Eko Nugroho, "The East Asian Monetary Cooperation: A Survey of Recent Progresses," *The Indonesian Quarterly*, Vol. 32, No. 2, 2004, pp. 194~214.

註⑤ 所謂的道德風險危機是指如果有一個確定能夠做最後救援的機制存在，可能會讓有些國家的執政者為所欲為而無所忌憚，最終導致整個合作機制的崩潰。這考量往往是IMF不願意無限制提供援助受災國的最好說詞。David C. L. Nellor,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 Ross H. McLeod and Ross Garnaut, *East Asia in Crisis* (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260~261.

註⑥ 美國從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的亞洲政策中最重要一點就是防止此區域產生一個區域強權，甚至過去半世紀左右還在此區域打了二場主要戰爭。參閱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James F. Hoge Jr. & Gideon Rose, ed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3), p. 3.

東協與中國所欽羨的對象。以往美國一向利用亞太經濟合作 APEC 此一橫跨太平洋之組織，做為壓制東亞經貿組織成立的藉口，也利用這平台維持美國在東亞的經貿利益。然而 APEC 在面對東亞金融風暴時的束手無策和美國政府時常利用 301 法案、外國商品配額及自我設限等制度，以保護本國商品的事實，都讓東亞各國為之氣結。再加上近年來美國在外交事務上的強勢作為與反回教世界之作風，終於使東協與中國下定決心，組成一個排除美洲及澳紐勢力的自由貿易區。

儘管美國不願意被排除在東亞共同體之外，面對此一發展，她也只能積極採取各種應對措施。首先美國希望強化 APEC 的經貿機制，配合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所推動貿易自由化的目標，來抵銷區域經貿組織的殺傷力。APEC 早在一九九四年印尼茂物（Bogor）所舉行的高峰會時就定下時程，包括已開發會員體在二〇一〇年、開發中會員體二〇二〇年以前達成自由貿易與投資的目標。只是這些規模宏大的目標後來在美國與東協的不同發展方向，以及東亞政經新發展之下被擱置，未來實現的可能性已大為降低。^⑦其次是和東南亞各國簽訂或洽談雙邊自由貿易區協定，包括新加坡和泰國等，^⑧即所謂的 EAI（Enterprise for ASEAN Initiative）機制。^⑨只是美國農業一向受到政府強力補貼，有關農業的利益團體在國會影響力其大無比，美國政府自然不會為了一個中小型國家的雙邊協定而做太多讓步，實質進展有限。因此如果沒有新的危機或重大事件發生，美國很可能被排除在東亞共同體之外。

雖然如此，美國手中還是有許多非經貿之籌碼可以利用，而美國已經在運用當中。美國許多戰略專家對於東亞共同體成形的解讀，除了東協主觀因素，其他最重要原因是中國在企圖把美國勢力踢出東亞，以建立中國在東南亞甚至整個東亞的霸權。^⑩美國當然不會坐視這種情形發生。籌碼之一是在本年二月利用美日安保條約的解釋，把台灣海峽的安全列入美日的共同安全顧慮，用意除了警告北京不要破壞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以外，還間接提醒東南亞各國美國仍然是克制中國企圖獨霸東南亞的最好夥伴。日本則一方面國內民族主義和右派保守勢力抬頭，另一方面眼看中國近年來軍事支出大幅增加，已經危及台海安全的考量下，同意美日安保條約的新

註⑦ 其實那時候暗中反對最力的是日本，她不希望美國藉此機制順利進入東亞市場，而影響到日本在東亞的經濟盟主地位。美國對日本的反制十分不滿，克林頓總統就取消原定參加 1995 年在日本大阪舉行的第三次 APEC 非正式首腦會議。有關茂物高峰會以後 APEC 的進程，參閱陳峰君，*當代亞太政治與經濟析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224~227。

註⑧ 新加坡由於沒有農牧業負擔，分別和日美等國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至於其他東協國家，面對美日等國的農牧業保護政策，在談判時困難重重，也加強東協希望以集體力量爭取更有利條件的決心。可參閱 Fukunari Kimura, "Construction of FTA Networks in East Asia," *Jap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7, No. 3, Fall 2003, pp. 168~184.

註⑨ 洪財隆，「中國與東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的進程內容與效應」，*當代中國研究通訊*，第四期（2005 年 3 月），頁 13~17。

註⑩ 這觀點是筆者和一些不願意具名的東南亞戰略專家們討論時，對方所提出來的解讀。他們很憂心美中兩國是否會因此是而引發進一步的戰略競逐，更不願意東南亞成為美中兩強競逐的主戰場。

詮釋。^①

籌碼之二則是美國企圖說服歐盟不要解除對於中國的武器禁運。美國和歐洲主要國家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以後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以抗議北京政府的殘殺民運人士。美國一直沒有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歐盟卻在經過一段長時間的辯論後，決定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中歐雙方面在經濟、外交、醫學研究等各方面的合作十分順暢，當然是歐盟做此決定的因素之一；許多歐盟國家不滿美國在攻打伊拉克一事上的獨斷獨行，以及希望國際社會重新回到多元體系的心態，也是不顧美國反對而解除禁運的心理因素之一。^②美國在眾議院以 411 票對 3 票通過決議案，要求布希總統向歐盟領袖施壓不要解除武器禁運。布希總統在今年二月底訪問歐洲各國時親自遊說他們，希望他們不要幫助中國而破壞台海之平衡。雖然歐盟這次不一定同意，美國已經成功藉此提醒東南亞各國，中國日益擴充的軍事力量將可能破壞東亞的戰略與安全生態。

其他手段還包括積極拉攏東協國家，以做為日後平衡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獨強的準備。譬如美國政府在今年二月底宣布恢復和印尼軍事訓練計畫，該項計畫已經停止長達十三年。美國國會當初是懲罰印尼軍方在東帝汶（East Timor）的血腥攻擊當地爭取獨立人士，而通過決議案否決該項計畫之經費。現在儘管反對黨議員和美印兩國人權團體的強烈反對依舊，美國政府同意恢復該項計畫，除了有共同的敵人—凱達組織以外，拉攏印尼軍方之心極為明顯。^③在這事上吾人還可以把美國對中國及印尼做一對比：同樣是懲罰外國政府的殘暴手段，對中國是由總統親自出面說服第三者繼續維持制裁；對印尼就恢復軍事合作計畫並大肆拉攏。這中間拉一貶一的戰略意涵呼之欲出。

此外，美國在東亞下面還有澳大利亞這個最支持美國全球反恐戰線的盟友，透過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的戰略與安全上之合作，美國在東亞仍然可以維持其安全戰略監督者之角色。早在九一一事件之前二個月（當時美中關係曾因為軍機相撞事件而陷入最低潮），澳大利亞外交部長都那（Alexander Downer）就曾經倡議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的三邊安全戰略對話，以做為未來美日澳三角聯盟的基礎。這項提議引發中國的強烈批評與東協各國的質疑，而改為美日、美澳加上日澳之間的「軟性多重機制」（soft multilateral dynamic）。^④透過類似機制，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在東亞的真正戰略佈局：在東北亞以日本北從北海道、南到琉球群島的軍事和情報基地，監控俄羅斯、北韓及中國的軍事活動；在東南亞除了拉攏各國政府以對抗回教激進組織以外，澳大

註① Charles Snyder, "US, Japan Talk about Taiwan's Safety," *Taipei Times*, Feb. 20, 2005, p. 1.

註② 表面上法國外交部長 Michele Alliot-Marie 的解釋是賣一些先進武器給中國，可以減緩中國自行生產武器的時程，但是賺錢以維持國防工業的正常運作和反美以及自主心態因素無疑是其他主要考量。*Taipei Times*, Feb. 17, 2005, p. 1.

註③ <http://www.nytimes.com/2005/03/01/international/asia/01indo.html?pagewanted=print&positi>.

註④ Purnendra Jain and John Bruni, "Japan,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Little NATO or Shadow Alli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4, 2004, pp. 265~285.

利亞是美國監控整個東南亞的戰略核心。未來美國和澳大利亞如果真被排除在東亞共同體之外，美國可能透過和澳大利亞建立自由貿易區甚至在澳洲駐軍方式，以免澳大利亞被東亞邊緣化。^⑦

日本的關鍵角色與兩難處境

夾處在美國、中國與東協三股各有不同戰略思維的日本，具有極為關鍵性的角色，但是她也面臨一種近乎兩難的地位，很難滿足所有三方的要求。日本好不容易從一九九〇年代以來的泡沫經濟破滅中逐漸復甦，突然發現東亞呈現出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一個對美國充滿疑慮與批評的東南亞正在和一個活力充沛的中國聯合起來試圖把美國、加拿大、澳紐等白種人國家排除在區域整合之外；中國不論在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大幅擴張不僅僅挑戰日本在東亞的絕對優勢，還意圖把美國勢力逐出東亞；而美國則大力拉攏日本，並希望日本重新建軍，以壓制中國的企圖心與維持在東亞區域的經貿與戰略利益。^⑧在此同時東協希望日本說服美國，東亞共同體的成立並不是針對美國或白種人而來；中國宣稱自己是一個和平崛起的強權，也沒有危害到日本的利益；美國則希望日本能夠共同監控與甚至壓制中國試圖稱霸東亞的野心，還希望利用日本對東南亞各國政府的強大影響力繼續留在東亞。從這角度言，日本任何決定都是舉足輕重的。

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日本很難做出一個既符合國家利益又能夠滿足三方面需求的政策。首先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國，憂心忡忡的日本朝野瀰漫一股綜合民族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浪潮：一方面建立國內的共識、加速往所謂的「正常國家」進行，^⑨前年六月日本國會所通過的有事三法（the war contingency laws）就是一個重要里程碑。^⑩另一方面則大力支持小泉首相以及小澤一郎的民族主義或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為代表的右傾路線。^⑪剛卸任的美國駐日大使貝克（Howard H. Baker Jr.）的觀察十分敏銳：「未來日本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安排與中國的關係……日本是一國超強，中國是一個即將成爲的超強。她們都很有錢，在此區域也都有長久歷史與傳統，但是她

註⑦ 中國的戰略學者以「小北約」來形容美日澳聯盟。Z. Xiao, "Mini NATO in Asia Pacific Region Plan by the US and Australia," *Beijing Review*, Sep. 9, 2001, p. 20. [http://www.bjreview.com.au.cn/2001/200137/GlobalObserver-200137\(B\).htm](http://www.bjreview.com.au.cn/2001/200137/GlobalObserver-200137(B).htm). 澳大利亞政府曾經慎重考慮美國在澳國駐軍以換取美國同意和澳國簽訂自由貿易區協定。Purmendra Jain and John Bruni, *op. cit.*, pp. 273~282.

註⑧ <http://www.stratfor.biz/Story.nsf?storyId=216265>.

註⑨ 這包括修改二次大戰以後所制定的非戰憲法，擁有自己的軍隊（非目前的自衛隊），甚至脫離美國的拘束而走出自己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可參閱陳鴻斌，「日本政壇的『石原陰影』」，*中國評論*，2002年10月，頁66~69。

註⑩ 日本東京大學名教授 Akio Watanabe 即指出經由通過有事三法，日本已經模糊的超越戰後和平憲法之框架。Akio Watanabe, "Has Japan Crossed the Rubicon? Defense Policy Since the Higuchi Report," *Jap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7, No. 4, Winter 2003, pp. 238~254.

註⑪ 徐萬勝，「日美同盟與日本的軍事大國化傾向」，*當代亞太*，2004年第4期，頁10~14。

註⑫ <http://www.nytimes.com/2005/02/22/international/asia/22japan.html?ei=5070&en=76cb72594>.

們彼此不太喜歡。」^⑩只要中國的軍事力量持續強大下去，日本遲早走向重新建軍之途，甚至發展核子武器，雖然這可能會招來南韓、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強烈不安與批評。日本前防衛廳政務次官西村眞悟在一九九九年八月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的言論即充分代表日本中生代政治家的心聲：「我們應該擁有航空母艦、遠程導彈和遠程轟炸機，我們甚至應該擁有原子彈。」^⑪

再者日本面臨東協與中國所倡議的自由貿易區甚至東亞共同體之體制，東京政府似乎只能選擇加入，以免喪失其在東亞經濟與外交事務的主導地位；然而跟在中國之後加入，不論在聲勢與心理上已失先機，也讓中國取得某些規則制訂上之優勢。東協各國在組建東亞自由貿易區與東亞共同體的過程中，體驗到透過中國迫使日本跟進的成效。^⑫欣喜之餘，似乎更堅定往排他性的東亞共同體邁進。不過日本即使跟進，其國內的超高物價與對農牧業的保護政策仍然是東京政府之最痛，不知如何在安撫國內農牧業與接受東亞經貿共主的兩難中間取得平衡。儘管日本學者 Kimura 認為目前日本政府各部會的中層幹部普遍有加入東亞區域整合的認知，^⑬只是這些問題一定牽涉到複雜的政治與選舉考量，未來日本政府如何在談判中取得平衡點，還有待時間的檢驗。

還有就是同樣或者更複雜的美國因素。美國希望靠日本之力留在東亞區域整合機制內，日本對此未必完全同意（APEC 的貿易自由化時程被擱置，有媒體就分析是日本有計畫的動員東協各國之結果，目的就是維持日本在東亞的經貿霸主地位），也可能心有餘力不足。^⑭另一方面東協和中國想排除美國勢力，卻希望日本當說客取得美國諒解，已經夠讓日本政府傷腦筋了。再加上日本國內的右派思潮興起，拉美圍中固然是其中一個主要觀點，脫離美國小老弟角色，走向正常國家才是他們真正的理想。目前日本政府的做法是經貿親東亞、軍事安全依靠美國，可能是最能兼顧當前東亞局勢的策略。只是未來隨著東亞共同體的成熟運作，日本政府勢必在親美或親東亞，圍

註⑩ 中國評論，2003年3月，頁80。另外在2003年11月大選前的一項民調中顯示，每8個候選人當中就有1人認為日本應該考慮擁有核子武器，自民黨的候選人更有三成支持日本核武器。張玉國，「挑戰與應戰：變化中的日本政治」，**東北亞論壇**，第13卷第2期（2004年3月），頁84~88。

註⑫ 這項心得東南亞各國學者與官員表面上不明言，在私下場合則普遍很得意的表示類似所謂的「以夷制夷」策略之成功。

註⑬ Fukunari Kimura, *op. cit.*, p. 168.

註⑭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 17, 1994, p. B12.不過現在中國羽翼已豐，日本無法維持以往的獨霸情勢。此外日本眾多企業在中國投資，利用當地廉價勞工在全球攻城掠地，卻也使得日本對中國依賴或者雙方互賴甚深，也某種程度會限制日本政府的決策。

註⑮ 日本媒體和學術界在冷戰結束後的一九九一年中到一九九二年中展開一場大辯論，爭辯日本應該維持美日聯盟體系或是認同東亞區域主義。辯論並沒有一定結果，只是自此日本逐漸認識到東亞區域主義的未來發展趨勢。Eugene Brown, "The Debate over Japan's Strategic Future: Bilateralism versus Regionalism," *Asian Survey* (June 1993), pp. 543~559; *Japan's Search for Strategic Vision: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Carlisle Barracks,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1993).

堵或接受中國等問題上選邊，^⑥而這些選擇將會決定東亞政經版圖的重組。

伍、結論：東亞高峰會的競逐

亞太的政經生態即將在未來數年中發生結構性的改變，而今年十一月於馬來西亞所舉行的東亞高峰會正是各方勢力競逐的主戰場之一。在今年二月於越南河內所舉行的東協資深官員會議中，柬埔寨代表散發一份由中國所提議的文件，主張只有東協國家能夠主持東亞高峰會議，其他中日韓只能在主辦高峰會時擔任主席。這項提議受到東協各國普遍歡迎，卻引進日本的緊張。日本方面隨即提出另外一項提議，主張未來的東亞高峰會應該採取共同主席制。日本的提議卻很快遭到與會代表的否決，讓日本方面很難堪。這是因為東協代表們認為共同主席制會弱化東協的地位，還會讓日本有機會推動一些傷害東協利益的議案，譬如日本一直主張東亞共同體應該包括美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⑦從這次的交手可以看出中國和東協在籌劃東亞高峰會的共識，與日本急欲重新取得發球權的心態。

另一方面，東協內部的幾個國家提出比較妥協的方案，試圖緩和中日美三強之間的競逐，以及東協和三強的互動關係。新加坡外交部長 George Yeo 在訪問華府時表示新加坡希望印度、澳大利亞和紐西蘭能夠加入東亞共同體，很明顯的不願意東亞共同體被套上反白種人的大帽子。^⑧泰國則提出一種複雜的三層主席和共同主席議案，包含了中國和日本的兩項提案，再加上類似東亞區域論壇模式的共同主席制度，希望能滿足各方需求。^⑨以東協做決策時一向採取妥協取得共識，以避免對立的模式來看，東亞高峰會的形式可能會在中日兩國的提議之間取得平衡點，而且會利用時間因素做為主要考量點。換句話說，在東亞高峰會和東亞共同體之初期可能以東協加三形式舉行，待功能與運作日益成熟後，再逐漸擴大加入亞太區域的新成員國。不過美加兩國要加入東亞共同體的運作，可能是高度困難的任務，因為如此一來東亞共同體無異於已行之有年的 APEC 聚會。

最後綜合前面分析，吾人可以繪出一幅未來東亞區域的權力分配與競逐圖。在政治與外交事務上，美國、中國與日本將會分享主要發言權與影響力；東協、南韓與澳大利亞則在相關事務上發揮影響力。經貿方面，日本與中國將會成為帶領區域發展與整合的雙火車頭，如果有下一次金融風暴發生，可能會促成亞元的誕生；美國在貿易糾紛之談判與經濟競逐上，將會面臨另外一個歐盟，屆時全球經濟三極化的景象必然成形。至於軍事與安全戰略事務上，美國在全球軍力與國防科技的領先與獨霸地位毫

註⑥ http://www.asianewsnet.net/level3_template2.php?13sec=11&news_id=36313&key_word=Ea.

註⑦ Eugene Low, "US Focused on Asia, Says S'pore FM," *The Straits Times*, Feb. 27, 2005, p. 1.

註⑧ http://www.asianewsnet.net/level3_template2.php?13sec=11&news_id=36313&key_word=Ea.

無撼動，而日本、南韓、台灣與東協都需要美國的軍事力量以監控與制衡北韓、中國與俄羅斯，因此美國仍然會在東亞扮演監督者的角色。也因為東亞仍需要美國軍事力量的支援，東亞在經貿事務上與美國談判時可能還是會略居下風。整體而言，東亞、北美與歐洲，是一個不等邊三角形的三邊，東亞的邊長顯然最短，北美最長。不過比起以往全球只有兩邊的畸形圖而言，東亞的發展與進步是值得吾人高度期待的。

* * *

（收件：94年3月18日，接受：94年5月6日）



The Emerging East Asian Community in the Asia-Pacific Area

Rong-yung King

Research Fellow, First Divisi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first,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Asia-Pacific are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ast Asian reg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Secondl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hanging role of major players in the are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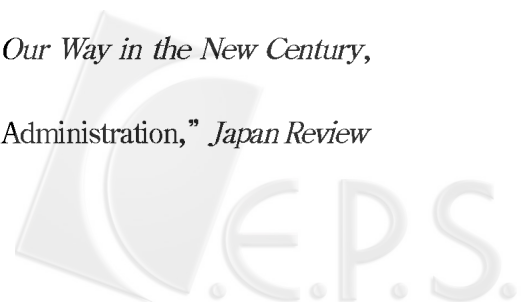
The major argument of this article i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ill face a critical setback in foreign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f the East Asian Community is to formulate and function in the coming decade. The US roles in East Asia will shift from a militar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ominator to share political power to compete in economic and trade affairs, and to supervise or arbitrate, in security affairs. In East Asia, China and Japan will emerge as the co-leaders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ffairs.

Keywords : East Asian Community; East Asia Summit; East Asian regional integration; US foreign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參考文獻

- 日本三菱綜合研究所著（1990），日本文摘編譯中心譯，**全預測 90 年代的日本**，台北：故鄉出版公司。
- 林家如（2001），「台灣參與 APEC 之政經意涵與策略」，李瓊莉、徐遵慈編，**APEC 與兩岸關係發展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43-45。
- 林欽明（1999），「APEC 十年回顧與展望」，**台灣經濟研究月刊**，22：12，13-16。
- 洪財隆（2005），「中國與東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的進程內容與效應」，**當代中國研究通訊**，第四期，三月。
- 陳峰君（1999），**當代亞太政治與經濟析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Akrasane, Narongchai and David Stifel (199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EAN Free Trade Area," Pearl Imada and Seiji Naya, eds., *AFTA: The Way Ahead*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Anwar, Dewi Fortuna (1994), *Indonesia in ASEAN: Foreign Policy and Regionalism*,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Bergsten, Fred & Marcus Noland, eds. (1993), *Pacific Dynam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Crawford, John ed. (1981),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 Suggestions for Action*, 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 Godement, Francois (1999), *The Downsizing of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 Haggard, Stephen (1984),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 2 (Summer), 343-370.
- Henderson, Callum (1998), *Asia Falling?* Singapore: McGraw-Hill Book Co.
- Higgott, Richard (1994), "APEC: A Sceptical View," Andrew Mack & John Ravenhill, eds., *Pacific Cooperation*, St. Leonards, NSW: Allen & Unwin Australia Pty Ltd.
- Hoge, James F. Jr. & Gideon Rose, eds. (2003),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Holloway, Nigel (1991), *Japan in Asia*, Hong Kong: Review Publishing Company.
- Jain, Purnendra and John Bruni (2004), "Japan,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Little NATO or Shadow Alli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4, 265- 285.
- Kimura, Fukunari (2003), "Construction of FTA Networks in East Asia," *Jap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7: 3, Fall, 168- 184.
- Krugman, Paul (2004), *The Great Unraveling : Losing Our Way in the New Century*,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 Matsuo, Fumio (2003),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Jap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all, 17: 3, 201-217.



- McLeod, Ross H. and Ross Garnaut (1998), *East Asia in Crisis*, London: Routledge.
- Neher, Clark D. (1991), *Southeast Asia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Era*,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Nugroho, Agus Eko (2004), "The East Asian Monetary Cooperation: A Survey of Recent Progresses," *The Indonesian Quarterly*, 32: 2, 194-214.
- Owen, Norman G ed. (2005),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Southeast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chapter 27.
- Said, Edward W.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New Century Publishing.
- Stiglitz, Joseph E. (2002),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 Vatikiotis, Michael R. J. (1996),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 Wanandi, Jusuf (2004), "Challenges to the East Asian Community and the Moves Forward," *The Indonesian Quarterly*, 32: 2, 111-116.
- Watanabe, Akio (2003), "Has Japan Crossed the Rubicon? Defense Policy Since the Higuchi Report," *Jap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7: 4, Winter, 238-254.
- Xiao, Z. (2001), "Mini NATO in Asia Pacific Region Plan by the US and Australia," *Beijing Review*, Sep. 9, 20.

